目　　录

德阳文庙……王朝华　1

何北衡与四川水利……黄天涛　9

邱蓁筠老师捐书记……蒋俊德口述　王朝华整理　15

李调元编戏育人……曹遵哲　19

[illegible]园遗址忆先贤……刘仁铸　22

民族企业者赵宗浚、赵宗汉创业记……黄天涛　王朝华　25

德阳潮扇……陈筠　王朝华　28

德阳豆鸡……刘仁铸　31

德阳协合蔡厂……江志钧　33

解放前德阳抓丁见闻……李　辉　3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德阳文庙

王朝华

一九五三年秋，省文史馆及参事室来了很多老先生参观德阳文庙，大家认为德阳的文庙雄伟壮丽冠甲全川，仅次于山东曲阜。曲阜的孔庙大殿的龙柱虽是整雕，但较矮与整体显得比例失调。而德阳孔庙大殿的龙柱虽系合雕，但比例均匀，更显得雄伟壮观。同时两个六角亭，更属建筑中珍品，四株桂树为世罕见。在大家赞赏声中，其中有位杨老先生忽然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问贵县属几等县？有何名人及何代帝王出此？"我答云："德阳自清以来属三等县，方圆五十里，条粮八千余"。杨又问："为何三等县修如此之大孔庙，岂非"僭越"犯禁，这在当时绝不容许，此中必有原因，希能找出根据，说明其原由，以供游人鉴赏。否则在当时要修建如此规模之庙宇，是绝不可能"。经他这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当时刘光远老先生答道："德阳是汉姜诗及秦宓的故里，又系什邡候封地，是否因此县虽小而庙可大也"。杨云："恐亦非也，若以此故，则新都有杨升庵，崇庆有杨迁春，彰明有李白，成都有刘备，王建等，而其庙皆不如贵县，此又当如何解释呢"？经他这一辩驳，德阳文庙为何规模如此之大，其原因何在？这竟成为一个值得考研的问题了。我查阅县志、询问老人，皆不得而知。后又遍访石木老工，仍无结果，又去找建筑社(现已改为公司)刘洪钧同志提供石木老工人的线索，据他说他的祖父曾修建

文庙，父亲及么叔培修过文庙大殿，皆已去世。据说有个姓张的木匠，也是世代的老木匠，同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修过文庙，听说此人还在，就是不知道现在何处。因此我四处打听张木匠的下落，后来打听到张木匠在大汉乡宝峰寺坐，我便专程去宝峰寺(天元七大队)调查了解，找到了张木匠本人。当时张木匠已经七十九岁，名叫张之南，曾读过几年书，身体很好，对新社会很热爱，性情开朗，无话不说。我便问他有关修文庙的事，他说他只和父亲一起修过启圣殿(现后殿)，那是光绪末年钮大老爷修的；他父亲跟着他爷爷修过大成殿和东西庑，那是道光年间"捍面棒"张大老爷修的。我问他张大为什么修得比成都的文庙都要大些呢？他说这多亏得"捍面棒"老爷手下的一个师爷出的主意，要不然是不会修这么大的。我问他出的啥主意？这下张木匠便打开了话匣子说开了：

那位张大老爷怪得很，既不通情又不达理，所以罗江县人给他取个绰号叫"捍面棒"，说他一窍不通，他当官不准人家买田地，要是一家人买上了两千亩田地，就是犯法。罗江县何、毛、杜、高四姓绅粮对他不满，一家姓毛的已经有了一千多亩田还再买，他硬是把人家拉去关押了半天。这样惹动了四姓绅粮去京告他，不但没有把他告垮，反而由罗江四等县升到德阳三等县当县官。罗江县的绅粮不服气，打算还要继续告，就来约德阳县的刘、郭、江、铎四姓绅粮一起去告张大老爷。德阳县四姓绅粮不愿干，也不敢干、常言道"灭门"的知县。岂敢随便得罪、因此推了。罗江的绅粮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可是姓毛的不甘心，非要报仇不可，便对人说："有人能把'捍面棒'告垮，我愿以两百亩饱水田相送"。德阳有个"烂秀才"跑去对毛说，他能告

垮“捍面棒”，并且一告即垮，不信你先拿两百两银子给我，告垮了再送我的地方。毛问秀才怎么一个告法？秀才说你先莫问，告垮了再说。毛偏要问个究竟，秀才偏偏不说。毛说：“你不说，我就不愿拿出两百两银子”。“秀才说：“你不拿银子也就算了”。起身就走，毛又怕失掉机会，忙说：“先生且慢，我这里先拿一百银子给你，事成之后再行重谢，绝不失言”“好！一月后请听佳音”。秀才拿着银子就走了。

过了几天，秀才拿着大红禀帖来向张大老爷请安。先是问安道喜，后来却说：“父台为何不请调他县？而来德阳小邑？”张道：“此乃皇家所遣，焉敢违命！“秀才叹息道：“可惜一位忠良的贤父台！”张诧异道：“贤契何出此言”？“父台来此不久，尚不谙小邑情况，德阳虽是山明水秀礼义之乡，历出贤宰，惜乎不善而终，自鼎革七贤尽节，以及其后数任不幸之遇，此皆天道地舆之故也”。这样一说把一个张大老爷说得毛骨悚然，忙问是何原因？秀才故弄玄虚欲言又忍，张大老爷再三追问，秀才才说：“生员久仰父台贤达，故敢略陈其愚，尚祈父台见谅”。“不用客气，是何原因，尽管实说”。秀才道：“皆因衙后十里灵嘉庙有四根大树，压着本衙龙脉。有碍县宰命运，故来此作官者每遭不幸，很少幸免，如前任县台上任不久即丁忧而去。是故生员深为父台惋惜”。张素信风水，这一说更把他说得胆战心惊，忙问：“是公树还是私树？”秀才答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士莫非王臣，当然是公树而非私树也”。张接说：“那好办我叫人去砍了即是”。秀才笑道：“此不但护了贤宰，而且有淳民风，，免致德阳四姓称强要霸”。说得张大

老爷眉开眼笑："多承赐教，以后请常往来"。

不数日，张果派人将四根树砍去，秀才大喜，立即去会四大家族头人，说："'捍面棒'真凶悍骄横，一窍不通，竟将你四姓龙脉毁坏，刘氏梭罗、郭氏卧龙、江氏金盆、铎氏蛤蚂皆赖此而昌盛发达，而今被其毁坏，从此你四姓绝矣！此昏庸县台，以后县人将何以处？"因四家祖坟都在四根树附近，故信以为真。遂联名控告张大老爷侵吞公树，不敬神灵，毁坏风水等罪。张闻悉甚惊惶，忽师爷前来向张道喜，张说道："今县人已将我告发，年兄何故相讥？""正因彼等诬告，才是东翁升官发财之机，故耳前来道喜"。张闻其言有因？忙说："请年兄明以告我"。"请东翁先取二百纹银给我，某当详告"。张无可奈何，只好拿二百银子给师爷，师爷从袖中取出一纸交张，张一看原来是控告四大家族的奏褶，内写：……德邑民心险恶，不遵王化，自鼎革至今历经百余年，圣庙失修，致使民风刁敝，职为倡圣教，挽颓风，伐公树、修圣庙何罪之有？！而四姓刁民竟邀王法，诬县官，由此可知民风之恶……是以急待修圣庙，建圣祠，而倡教化也。张看后大喜，"请年兄派员速速送京"！"大人若欲将此呈速送京去，还请再拿二百银子来""拿来何用？""马上派人到山东曲阜打来式样，照曲阜孔庙修建，若无此图样恐难办理"。"修圣庙何必去山东打样，本县灵工巧匠岂少也哉？""卑职之见非照曲阜式样不可，否则你砍伐如此大树，必遭刁民辩驳，说你修庙是假，毁坏风水是真，大人又将何言以辩。"张大爷又惜疼钱，又怕照曲阜修大了犯禁，于是便说那"僭越"之罪谁敢承担？师爷点头笑道："这个当然应该考虑，我认为随文附上图文样式，皇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批了，我们就照图样修，是遵旨修建，则无“僭越”之言，若皇上不准，那也是遵旨免修，虽然伐树，刁民再告也无用，故此实双管齐下之善策也。”张无可奈何，只好再拿出二百银子，师爷又从袖中取出一纸，张一看，是一张山东曲阜圣庙图，便说道：“先生如此神速，已将图样画好？”“大人为何健忘，卑职乃圣乡人也，在写奏褶时，我便请来灵工巧匠，我说他们画，因此制成此图，以便随文附上，虽然如此，但要闯过“僭越”这一关，还须呕心沥血，费尽心思，故取此二百银子不为多也”。张只好忍气吞声道：“诸事请先生费心办理，如有所需张某绝不惜疼”。

这位“绍兴师爷”果真历害，他写的奏褶，尽都是些“马吃胡豆——三二滚”摇得动，扯不落的话，在奏褶上只说要修圣庙，现附图呈上，请批示，也不说照图修或不照图修。皇帝一看这很简单，就批了“准此”二字。张大老爷一见，喜出望外，师爷真有办法，师爷却说：“大人且慢欢喜，请问修如此大庙，钱从何来？”这一问可把张大爷问呆了，“这……这还须为我筹划，筹划”。“那请大人再拿二百银子我好安排”。张大老爷只好再拿二百银子给师爷，师爷从袖中取出一纸交张一看，又是奏褶，其中请拨款修建圣庙，但也不说数目，只说这是皇上御批照曲阜圣庙式样修建。当时道光年间国家虽然困难，但又有谁敢违抗皇上的御旨，只好批准免缴三年粮税，用以修建圣庙之需。这下师爷才来给张大人道喜，同时他要求经管此事，一定要遵皇帝批示照曲阜圣庙样式修建。

四大家族告官未准，反而得罪了父母大老爷，因此送包袱，捐款、捐地讨好县官。所以德阳圣庙才修得那样大，那

祥好、庙产那样多，都是那位师爷出的主意，既保住张大老爷没有丢官罢职，而且修了这样大的一座大圣庙。可惜文庙没有修完工，张大老爷就死在任上，师爷也就离此他去，首人田瀛老师刚把庙修好，也因病而死。所以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没完工，就停工了。如圣庙外面的树子还没栽，杏林杏坛没有修，“道冠古今”前面的石人石马没钻好安上就了事了。后来陶大老爷修了“礼乐库”和节孝乡贤祠（现文化馆家属院和浴池），钮大老爷培修后殿及“明伦堂”，民国十七年又把圣庙改成公园，把棂星门前后的楠木树也砍光了，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真太可惜。

根据张木匠所说，我又翻阅《县志》，虽无详文记载其事始末原因，但细读《人物志》及《艺文志》各条，亦可发现若干“珠丝马迹”作为其事旁证，证明四大家族与张行忠之间的矛盾以及错综复杂斗争的痕迹。

一、修如此壮丽雄伟名冠全川的圣庙，而当时四大家族无一人参与其事，更无一人为之作文记其事。五十年后由于修志所需，始寥寥数百字应付了事，此其疑也一。

二、县志《艺文志》、《建学宫记》载……道光二十八年冬，江右盛候昙慨然劝捐……明春盛以忧去，继任滇南张候行忠谕劝如前，公议田瀛肩其事……不避劳怨……丹粉未竟，瀛以积劳卒……此文系光绪三十年邑贡生刘宸枫为修志而作，其文不把修圣庙的功绩归之张行忠，而突出盛田二人，试问修如此之大庙，而无县令上下奔走和支持可否能成？但不写张之作用，而写盛田功绩，此其疑也二。

三、《艺文志》、《学宫岁修碑记》竟把张行忠修庙之事一笔勾销“……前令盛公倡之，邑人和之，田子瀛而成

之。……”这真是欲盖弥彰，此其疑也三。

四、张行忠系道光时举人，由“科甲”出身，算是清官吏中之正统，在德阳为官，无显著劣绩。可死后，由于四大家族把持县中一切，对彼事迹未于记载，仅在《职官表》中载：“张行忠字怒堂，云南举人，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任，三十年没于任”。了了数语，对张修建圣庙只字未提，连出生何地，享年若干均未提。可对陶官修“礼乐库”，钮官修“启圣殿”却大书而特书，此其疑也四。

五、四大家族对修建圣庙之事力图掩盖其真像，抹煞张行忠之作用。更“讳莫如深”的对修庙之事避而不谈。如《人物志》第五十页江世清条载：“……县宰欲新文庙，即命子捐金三百两……”不以“修”文庙，而以“新”文庙来代之，此虽一字之别，而其义各异，此其疑也五。同时江自己不出面，儿子捐款又不落名，此其疑也六。当时捐款的人很多，有捐千两以上者，但皆未落名作传，可圣庙落成后不久，邑人彭伯隆只捐了二十七亩田地，值银不过数百两，而却大书而特书其善举，由此可知所谓捐者多系罚款，而美其名曰捐款，但又不愿落名，此其疑也七。

六、四大家族不但对张县令极端不满，而且对参与修庙的田瀛老先生也加以中伤，《人物志》第四十三页田瀛条中“……不辞劳瘁，罔顾嫌怨、三年卒底于成，惟工初减，未满志遂殁……”仅“罔顾嫌怨”一语，则道破其斗争激烈，其他各条对田不避嫌怨之誉尚多，此即不一一列举。

七、《建学宫记》中载有“……植桧、柏、楠、杏千株……”。可是庙内只有桧、柏、楠、而确未见有杏树，就连白果树也算作杏树（银杏），可也只有二株，是否因杏坛未

修，而杏林也就未培植了呢？从这些旁证资料看来，张木匠所说，去伪存真，不无可信之处可惜当我一九五七年将此情况获得后，欲请教于杨老先生时，因种种原因不便与杨老先生接触，延误至今，不幸杨老先生已去世多年，现写出此文以求教于长辈，证其说之真伪也。

附记：我县专管文教卫生事业的副县长程震同志，曾向我谈及他在绵阳时，曾有某老先生向他谈过关于德阳圣庙修建的始末。据某老先生说："清代德阳某县令，因贪污甚多，皇家略有所闻，将派员来查，县令恐事发获罪，遂将全部赃款献出，照曲阜样式修圣庙一座，上嘉其行，而未予追究其贪污云云"。虽然与张木匠说法各异，但其意相同，故姑记于此，以供史家参考。

注：

（一）梭罗、卧龙、金盆、蛤蚂此皆过去的阴阳先生打胡乱说，瞎取的名字，所谓"龙脉"地，拆穿了所谓"梭罗"就是刘家坟上长了一颗弯弯树，取"梭罗"坟，郭家的坟是在一条土埂上，取名"卧龙"坟，江家的坟是在一个凹荡荡里面，取名"金盆"坟，铎家的坟是在一个土包上，取名"蛤蚂"坟。

（二）因其地有四根大树，故以其名叫"四根树"现已成为地名。

（三）一千个小铜钱为一两，即是一串钱或叫一贯钱，约值银一两，几百两，即是几百两银子的意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何北衡与四川水利事业

黄天涛

何北衡，罗江人，出生罗江县殷实的大户人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投身于四川的政界，曾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因为他作事勤恳能干，很有朝气，引起了当权者的重视。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的当权派，这是他的前半生，我知道得太少，作好作歹，我可叙述不出来。

他既经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又结识了不少当权者，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出任四川省设厅长和四川省水利局长多年。

建设厅掌管范围广泛，有工业、矿业、农林、交通几大部门。旧中国被国民党政权搞得民穷财尽，四川更因经过多年军阀混战，早已财源枯竭，又当战争年代，哪能拿得出大量经费举办如此广泛的建设事业呢？因此他在建设厅长任内，并无出色成绩，只是应付当时局面，做些行政工作而已。从实践看来，他把精力财力重点放在水利事业方面，因此取得一定成绩，也许他觉得与其修那空泛的行政工作，到不如干些实事，也才不虚度一生吧！

旧中国有位李仪祉先生，终生尽瘁于水利事业，在陕西修了两座大渠，一名泾惠渠，一名渭惠渠，成功后博得全国好评。李仪祉的美誉，传播很广，何北衡不会不知，对他起了诱导作用，选中了水利事业，全力以赴，排除重重困难，经久不衰地干下去。

他在水利局长任内完成的工程计有：华阳沙河堡提水灌溉工程，巴县梁滩河、什邡朱李火堰，德阳獐子堰、三台可亭堰、遂宁南北坝、遂宁东山六坝、都江鱼咀，……等十多处。灌溉总面积三十多万亩。工程地点摆在川北的居多，其余地区也有。

旧中国的官僚，每就一职总要向报界宣扬："我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做官的"。但究其实际仍然是玩弄权术，摆摆架子，最多做一两件事撑持门面，以为晋升之阶。何北衡可不这样做，他对水利事业算是安下心来干，总希望多搞几个工程，多增加灌溉面积，也没有大肆张扬。

他常着三个荷包的学生装，给人以简洁朴素的印象，静坐时常将眼睑下垂，象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在默祷，其实他在沉思不是默祷，沉思的是他当前遇到的困难，要怎么办才能克服它。

他要完成上面列举的那些工程，不是轻而易举的，中间要费很多心思，突破很多困难，他必须具备很多值得称道的优点，才能达到目的。

我觉得他值得称道的有下述这些优点：

一、事业心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要办水利，第一个问题是经费在哪里？论理四川省兴办水利，当然应由四川省政府列入预算，拨交水利局使用，可是四川省政府哪格拿得出这笔巨款来，当时是全靠中国农民银行的水利贷款以进行工作。中国农民银行是掌握在cc系陈立夫、陈果夫手中，他们不会因为四川省要兴修水利就慷慨贷出，必须奔走于国民党政府的全国水利委员会、财政部、农民银行总行直至行政院。因此何北衡奔走于成渝两地，或

者借用省主席张群的关系，或者请求川籍参政员张澜等在参政会呼吁。或者请川籍名人卢作孚刘航琛等斡旋，要经过不少周折方可望贷款到手。

贷款到手后把工程铺开，不断贬值的国民党法币又使原来的预算失去实际意义，于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追加预算，其中周折更多，阻力不少，但他总是拿出耐心、毅力、百折不挠的做去，务必使工程完工而后已。所以他叹息地说："农民银行的门槛都被其踢断了。"这句话可以概括当时的困难情况。

国民党政府为了在四川攫走更多的财富，有时也拨下一两笔建设专款，一以表示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意，二以表示其"既在抗战，还在建国"。这类款项一经拨下，四川省的各方面都来伸手。负有经济责任的厅、局固然不说，并非建设部门的如民政厅也不放过，分明是民意机构的四川省参议会也提出建设方案，争夺这笔款项。何北衡在这种情况下也把握时机，动员舆论，提出"水利乃建设之根本，粮食为军糈民食之所必需"。呼号奔走，力争到手，以完成其水利事业。

我们想，要没有强烈的事业心，是不会这样费大力以求其必成的毅力的。

二、有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

何北衡把四川求利建设重点摆在川北地区，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公正的。

从四川全局看，川东川南地区，位置偏南，气候温暖，年雨量多在700毫米以上，这里固然也有水旱之灾、也需要兴修水利，但与川北比较，那有后者的迫在眉睫呢。川西地区

平坝多，年雨量比川南少比川北多，且历史上遗留的水利系统较发达，与川北比较更好得多。川北地区，土地瘠薄，年雨量多在500毫米以下，十年九旱，灾情最重、因此何北衡的作法是合理的也是公正的。

可是公正的作法，竟招来不少阻力。川东川南川西都群起而攻之，尤其集中反映在四川省参议会上。这些参议员们来自全川各县，为了表现其有所作为，都想争得一项水利工程，摆在自己的县境内，以显示其“敬恭桑梓”的“政绩”，以求得下属选举的连任，于是不顾全局，攻击何北衡偏爱川北，说他“四川四川，（指川东、南、西北）功在一川”。（指川北）。

对待这些事情，何北衡必须小心细致地去做工作，或者晓以全局，耐心说服；或者通过他人，反复磋商。因为所有预算必须在省参议会通过，工程布局也要在省参议会讨论，要费尽许多人事协商，才能达到目的。但他坚持以川北为重点的原则不变，绝不把工程用来送人情、求妥协，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何北衡也并非书生气十足，只讲原则不讲策略的。根据他多年从政经验，懂得动员舆论的重要意义，比如他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附近，摆上一个巴县梁滩河工程，四川省政府所在地成都附近，摆上一个华阳沙河堡提求灌溉工程以为示范，引导党政要员、参议员先生们和社会名流前去参观，以此动员舆论，促进其水利事业。

三、善于团结工程技术人员、放手任用干部。

抗日抗争期间，祖国大部份土地沦于日寇。因此，大量知名水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流入四川、西南地区高等院校

的土建工程。毕业生也挤在西南一隅，真是人才不少。何北衡把他们延揽过来，为四川求利事业服务，其中最著名的有这些人物。

李赋都，陕西人，全国著名水利事业家李仪祉先生的儿子，留学生，在川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任陕西省水利局长。

黄万里，河北人，留学生，在川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任河北省水利局长。

曹瑞芝，山东人，留学生，在川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水利局长。

张季春，河北人，北洋工学院毕业，原华洋义振会总工程师，有多年修黄河水利经验，在川任总工程师。传闻当其在职时，曾往重庆活动，谋夺取何北衡的局长职务，但未成功，何氏得知，仍留任总工程师如故。1946年得脑癌病重，何氏以巨金购放射性抗元素为其治癌，以示宽容和惜才，但不治逝世。

李镇南：湖北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在川继张季春后任总程师，直至解放后，改任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总工程师。

贾书河：江苏人，苏州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在川任设计科长，有多年水利工程设计和施工经验，解放后任成都市政府工程师。

李殿蒙：河北人，北洋工学院毕业，有多年施工经验，当时任工程科长。

吴应祺，四川荣县人，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有多年设计和施工经验，当时任工程师，解放后任川西行署水利厅厅长，合署后任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

除上述这些人物外，还有不少工程师、技术员，真是兵多将广，尽管布置许多工程处，也不感技术人员的缺乏。

何北衡对各工程处长及行政人员都能放手任用，赋予应有的职权，他只决定重大事务，使工作者无掣肘的感觉。

他自选定水利事业为其奋斗目标后，很少从事其它党政活动，当时某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党员中列有他的名字，那时有知情的友人向我谈及，系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号召选举人说："要把何北衡选进，象何北衡这样的人都不选进去、怎么说得上实行总理（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呢？"这几句话出在当时，其言可信。

何北衡因为是有抱负有志向的事业家。因此，凡有金钱都是用在工程上，唯恐不多，因此不致有贪财中饱的现象。在他的任期内，虽然经过大宗款项，局内局外，也没有传说他有不廉之处。

综观何北衡的水利事业，工程十多处，灌田三十多万亩，与李冰父子的都江堰（灌田三百多万亩）比较，只及其十分之一，与今日的人民渠比较（灌田近千万亩）更有天壤之别。但它是在极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完成的，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达到的，因此也是可贵的。

邱慕筠老师捐书记

蒋俊德口述　　王朝华整理

解放前，德阳县图书和报刊阅览事务，由县民众教育馆管理，未专设图书馆。当时馆舍简陋、图书不多。所有藏书，多系前清“宏道阁”旧藏遗物，不外经史子集残卷及其它古籍，新书极少。若想对群众启发新思想，灌输新知识，几乎无能为力。

前任馆长徐光涟老先生，为购置新书，多方奔走，筹得少量经费，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万有文库》一部，已属难能可贵，视如家珍。即因有此区区图书，尚请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豁蒙澹智”匾额一道、前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题“琳琅满目”匾额一道，两匾悬于馆外，金光耀眼，交相辉映，用以光大门楣眩惑世人，但馆内空空、藏书寥寥。远不能满足读者愿望。

我接任馆长后，检点旧籍，意欲有所整顿，充分发挥馆藏图书功用以餍读者。见有部份西方名作，很少外借。立即编目出借，读者称赞。但这批西方书籍，仍只限于文艺复兴时期及至十九世纪作品。要想传播新思想尤其是进步的革命的思想，靠馆藏的古典书籍及中古的西方书籍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为了传播新思想的目的，又要在旧的政治环境下去实现，我只得订了各种报纸如：《新新新闻》、《华西晚报》，

《大公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等。报纸到后，群众必争相阅读，可见当时县人的文化生活是何其贫乏。

我正为筹购新书而苦恼时，1947年3月，县政府文教科忽通知我："县人赵母邱慕筠老师将捐赠大批图书与民教馆，希去成都与之接洽"——这一通知，好似从天而降，使我喜出望外，立即前往。

邱慕筠老师，我是知道她的。她是我县老一辈热心教育的事业家。前清成都省立淑行女子学堂的高材生。民国初年曾任教于德阳县女子小学，可算是开我县妇女教学之先声，也是当时我县妇女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她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痛感国家民族之垂危，立教育救国之志。不幸早寡，抚育其女赵宗孟、两子宗浚、宗汉。四人相依为命，奔波于德阳、广汉成都之间，谋求教职。以微薄薪奉，维持四口之家。又当川战频仍，兵连祸结，工资七折八扣，物价成倍飞腾，风雨飘摇，茹苦含辛，其苦楚有令人难于想象者。

漫长的艰辛岁月，终被赵母熬过，抚育子女成长，无论环境如何不利，赵母仍不背其教育救国之夙愿。长女宗孟，长子宗浚年长后仍以教书为业，此即赵母热爱教育文化事业之初衷影响其子女的结果。次子宗汉无力读书，初中肄业仅两年，即入成都武学馆书局当学徒。三年期满，学得印刷技术，费尽筹措，才购得手摇石印机一部，在成都东华门开店营业，赵母取"大启文明"之意，命名为"启文印刷社"。开店后以印刷精美，价格低廉，取件又迅速准时，营业日有增长。1937年后抗日战争开始，成都印刷业大有发展。宗浚也投身经营，接办美信书局，于是招股集资，扩充为成都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